

儒法斗争与 祖国医学

兰州医学院 理论学习班
甘肃省新医药学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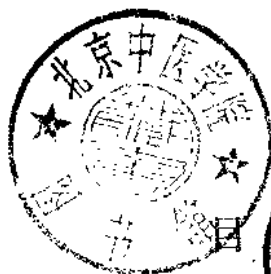
毛主席语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概 论.....	(1)
第一章 春秋战国及秦朝时期.....	(6)
一、春秋战国及秦朝时期儒法斗争概况.....	(6)
二、春秋战国及秦朝时期的医巫斗争.....	(9)
三、围绕阴阳五行学说的儒法斗争.....	(16)
四、秦始皇与祖国医学.....	(20)
五、我国现存最早的医书——《内经》.....	(22)
第二章 两汉及三国时期.....	(28)
一、社会历史背景和阶级斗争形势.....	(28)
二、两汉及三国时期的儒法斗争.....	(31)
三、批判“天人感应”论及其对医学的影响.....	(32)
四、两汉及三国时期祖国医药学的发展.....	(36)
(一) 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理学专著	
——《神农本草经》.....	(37)
(二) 我国第一部临床医学专著	
——《伤寒杂病论》.....	(39)
五、两汉及三国时期的重要医学家.....	(46)
(一) 民间医生淳于意.....	(46)
(二) 汉代唯物主义医学家张仲景.....	(48)
(三) 坚持革新的古代外科学家华佗.....	(53)

第三章 晋至五代时期	(60)
一、历史概况.....	(60)
二、晋至五代时期儒法斗争概况.....	(63)
三、晋至五代时期医药学的发展概况.....	(68)
(一) 在病原病理学方面的成就	(70)
(二) 诊断和治疗方法方面的进展	(71)
(三) 在药理学方面的成就	(74)
四、晋至五代时期的一些医药学家及其著作...	(78)
(一) 王叔和及其《脉经》.....	(78)
(二) 玄学派的儒医皇甫谧.....	(81)
(三) 葛洪的道教思想和医药活动	(83)
(四) 陶宏景的唯心主义思想对药理学的影响 ...	(87)
(五) 巢元方和《诸病源候论》	(93)
(六) 孙思邈和《千金方》	(96)
(七) 唐代法家刘禹锡和《传信方》	(100)
第四章 宋元时期	(104)
一、宋元时期儒法斗争与医药学发展的概况...	(104)
二、王安石变法对祖国医学发展的贡献.....	(108)
三、围绕“运气”学说的斗争是儒法斗争	
在医学领域内的反映.....	(109)
四、时方与“局方”、“经方”之争	
是革新与保守的斗争.....	(111)
五、注意实践、勇于创新、深入群众	
的沈括和唐慎微.....	(114)
六、宋元时期的学术争鸣.....	(119)
第五章 明清时期	(123)

一、明清时期思想领域的儒法斗争·····	(123)
二、明清时期儒法斗争在医学领域 中的反映·····	(127)
三、温病学派与伤寒学派的斗争·····	(131)
(一) 温病学派的形成与特点·····	(131)
(二) 伤寒派与温病派斗争的焦点与实质·····	(135)
四、新病原学说的创立·····	(138)
五、《本草纲目》与药物学的发展·····	(144)
六、其他医学家·····	(151)
(一) 具有法家思想的医学家傅山·····	(151)
(二) 勇于创新的王清任·····	(153)
(三) 清代儒医徐大椿、陈修园·····	(155)
第六章 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 ·····	(160)
一、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儒法斗争·····	(160)
二、近代儒法斗争在医学中的反映·····	(164)
(一) 西洋医学是怎样传入我国的·····	(165)
(二) 民族虚无主义的实质·····	(167)
(三) 中西医汇通派的产生及其在医 学中的进步作用·····	(169)
三、中西医结合是创立我国新医药学的 根本途径·····	(174)
结束语 ·····	(178)
附表一 我国历史上主要的奴隶、农民起义 ·····	(180)
附表二 我国历史年代简表 ·····	(181)
附表三 祖国医学大事年表 ·····	(183)
附表四 儒法斗争与祖国医学简表 ·····	(192)

概 论

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后，一个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正在全国蓬勃兴起。毛主席的指示，对于进一步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对于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搞好反修防修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孔孟之道，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加深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为现实的阶级斗争服务，为反修防修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两千多年来，我国历史上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也包括各个学科领域，医药学也不例外。因此，研究历史上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对我国医药学发展的影响，是医药卫生战线上深入批林批孔的一项重要战斗任务。这对于批判地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把卫生革命进行到底，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前进，是有重要意义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祖国医学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

起了重大作用，它也是我国劳动人民对世界作出的伟大贡献之一。祖国医学曾在历史上处于世界医学先进地位。早在约两千年前，在《内经》中，就有了关于人体解剖的记载，并发现了血液循环。汉末华佗应用“麻沸散”施行外科手术，是世界最早的全身麻醉术。武则天执政时，唐政府颁行的《新修本草》，是我国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较西方要早约800~1000年。宋代宋慈所著《洗冤录》是世界最早的法医专著。明代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不仅对药理学而且对世界植物学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免疫学方面，祖国医学也有重大贡献，如种痘预防天花就是我国首先发明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在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指引下，祖国医药学得到全面的发展，如针灸疗法不仅打开了聋哑禁区，创造了世界医学奇迹，而且发展成功针刺麻醉术，使针灸疗法起了质的飞跃。中医中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留传下来的这份珍贵遗产，在毛主席指引的中西医结合道路上发出了新的光辉。

恩格斯指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自然辩证法》）。医学的起源和形成，也是与劳动人民长期的劳动生活、生产实践紧密相关。距今约五、六十万年前，祖国大地就有我们的祖先在生活、劳动。中国猿人已知道用火。火的使用，使人类能抵御寒冷和野兽侵袭，而熟食则大大减少了肠胃道疾病，这在人类保健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劳动过程中，人类从利用自然火，逐渐发明人工取火。火的发明是人类发展史上一次极大变革。

“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

同动物分开。”（恩格斯：《反杜林论》）原始人从“穴居野处”到知道建造房屋，从赤身裸体到知道缝制衣服，都是通过长期劳动生活、生产斗争的结果。随着狩猎活动的进行，原始人模仿动物动作而舞，有些舞蹈发展成后来的保健体操。用火、住房、穿衣等这些人类自卫的措施，实即人类卫生保健的起源。药物的应用，起源于原始社会人们在狩猎、采集食物等劳动生产实践中对某些动物、植物性能的逐渐认识。由于误食某些有毒植物，轻则呕吐、腹泻，重则昏迷甚至死亡。在无数次的尝试后，逐渐认识了某些治病的植物或动物，这便是药物。原始人在劳动生活中，由于环境的恶劣而经常发生受伤之事。这既促使外治法的形成与发展，而且通过锐利石块或树枝刺伤身体的某些部位有时还解除了某些病痛，人类就知道使用砭石治病。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和铜器、铁器的应用，也由砭石发展到金属制的针，这便是针刺法的起源。灸法则起源于火的应用，通过温热局部可以解除疼痛的实践，逐渐发展成熨灸疗法。以上所述，充分说明医学起源于劳动。祖国医学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劳动生活、生产实践中与疾病作斗争而形成、发展起来的。

关于医学起源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世界观的尖锐斗争。儒家孔孟之徒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代表为了维护反动统治阶级利益，宣扬“圣人”创造医学和“医起源于巫”、“医源于人类本能”等唯心主义谬论，妄图否认劳动创造世界（包括医学）的伟大真理，贬低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他们特别鼓吹医学是某些“圣人”的天才创造，贩卖“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什么“医之始，本岐黄”，“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

针”，把医药的发明说成是传说中的帝王圣人的功绩。实际上，传说中的“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等等，不过是原始社会中某一历史阶段人类集体劳动生活包括医药活动的一些史实的反映，钻木取火、牧畜种谷、尝草知药绝不是某一个圣人的天才发明。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是主张“奴隶们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还是鼓吹“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区分点。

历史上的法家人物以及具有法家思想或受法家思想影响的医药学家，尽管他们程度不等的重视劳动人民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注意民间单方、验方，注重群众的实践经验，但他们由于历史条件与阶级的局限性，不可能真正认识到劳动群众创造历史创造医药学的伟大功绩。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不管如何杰出的法家人物及其医药学家，都不可能建立唯物史观，他们都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而在社会历史观上，则是唯心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法家人物以及具有法家思想的医药学家，他们不可能真正认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从而也不可能全面概括人民群众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经验。在我国历史上有些总结劳动人民与疾病斗争经验的医学著作，却被孔孟之徒加以歪曲篡改，冠以“黄帝”、“神农”之名，这是儒法斗争在医学领域里的反映。对于儒家孔孟之徒散布的唯心论的谬论，必须彻底批判，肃清流毒。

和其他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样，医学的发展也受着社会阶

级斗争的深刻影响。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深深地渗透到医学领域中，影响着祖国医学的发展。孔孟之流大搞尊经复古，鼓吹“死生有命”、“天人合一”等唯心论的“天命论”。儒家这条复辟、倒退、反对革新的政治路线和唯心主义思想严重阻碍了祖国医学的发展。而法家人物宣传“法后王”，宣传“制天命”、“明于天人之分”的唯物思想。法家这条革新前进、反对守旧复古的政治路线及其唯物主义思想促进了祖国医学的发展。

通过对儒法两条路线斗争与祖国医学发展的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到，思想政治路线正确才能指引一切事业发展前进，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毛主席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教导无比英明正确。我们一定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通过儒法斗争对祖国医学史发展的影响的学习，使我们认识到医学起源于劳动生产实践，是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斗争的经验总结，帮助我们进一步树立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对林彪一类骗子贩卖“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的反动性有更深刻的认识。研究儒法斗争与祖国医学发展关系，要按照“古为今用”的原则，吸取祖国医学中辩证思想和唯物论的精华，清除儒家掺入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糟粕，遵照毛主席关于中西医结合的一系列指示，为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药学而努力，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沿着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奋勇前进。

第一章 春秋战国及秦朝时期

一、春秋战国及秦朝时期儒法斗争概况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奴隶制社会发展到春秋时期日益腐朽反动，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由于奴隶主极端残酷的压迫剥削，奴隶们纷纷起来进行反抗斗争，许多地方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奴隶起义，著名的柳下跖起义队伍有“从卒九千人”，“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所到之处，奴隶主贵族闻风逃窜。奴隶起义和暴动沉重地打击和动摇了奴隶制度，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

随着铁器的使用，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开始出现。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打破了奴隶制的“井田制”生产方式，承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合法性。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鼎”，打破了奴隶制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奴隶主贵族特权。这都表明了地主阶级作为新兴的阶级在与没落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斗争中，已正式登上了政治历史舞台。

经济上、政治上这些新事物的出现，激烈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内来，毛主席指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

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正是在封建制与奴隶制这两种新、旧制度交替的历史条件下，在新兴的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夺权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春秋战国时期在文化思想领域里，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反映了当时不同阶级和集团之间的大论战。由于当时的主要阶级斗争是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的斗争，“诸子百家”就其阶级实质来说，不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就是属于没落奴隶主阶级。法家主张变革、宣传法治、反对“天命”的进步思想，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儒家反对社会变革、主张奴隶制的礼治、鼓吹“天命论”的反动思想，代表了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因此儒法两家的斗争就集中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和新兴的地主阶级之间的大搏斗。儒法斗争的焦点表现在三个方面：是“法先王”还是“法后王”；是“天命论”还是“制天命”；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政治代表的法家，之所以能够提出一些进步思想，是适应了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奴隶起义的革命实践，提供了法家人物以理论概括的丰富资料。

先秦时期儒法两家反映在自然观的斗争上，更集中地表现在对天的看法和如何对待自然界的变化的发展规律的态度上。

以孔丘、孟轲为代表的儒家，为了挽救奴隶制的灭亡，推行一条复辟倒退路线，“克己复礼”就是这条反动路线的政治纲领，他们鼓吹的“天命论”则是其反动路线的理论基础。孔老二宣称“天生德于予”，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要人们“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并恫吓

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孟轲也跟着叫嚣“顺天者存，逆天者亡”。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代表孔孟之流如此宣扬“天命”，就是要借助天命鬼神欺吓人民，妄图阻止奴隶造反，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儒家这种唯心主义的有神论，严重阻碍了我国科学和医学的发展。

以李悝、吴起、商鞅、荀况、韩非等为代表的法家，主张用革命暴力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实行彻底改革。针对孔孟之流“法古循礼”、“复经界”、“法先王”的反动观点，法家提出“法后王”、“废井田”奖励“耕战”的措施，主张“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的法治，对儒家复辟倒退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法家实行变革前进的政治路线时，在理论上同“天命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特别是杰出的法家荀况，对孔孟儒家的“天命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针对孔孟鼓吹“天人合一”、天能“赏善罚恶”、要人听从天命的谬论，荀况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指出：天是没有意志的，自然界有它自己的规律，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荀况反对听天由命、无所作为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人定胜天”的主张，他认为人不同于草木虫兽，人既是物质性的“气”所形成，有生命、知觉和思想，所以人是“最为天下贵也”。因为人“善假于物”，能“知物之理”，而且能“制物而用之”，因此，人定胜天。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天论》），意思就是叫人们不要盲目尊崇天，而要把天看作自然物，并掌握自然的规律，为人类服务。荀况的学生、集法家大成的韩非，也明确提出“当今争于气力”的战斗口号。这些光辉的唯物

主义思想，把人们从“天命论”的影响下解放出来，鼓励人们为彻底推翻奴隶制、积极发展封建制努力奋斗，不仅促进了历史的发展，也大大推动了科学和祖国医学的发展。

二、春秋战国及秦朝时期的医巫斗争

法家“制天命”与儒家“天命论”的斗争，反映在医学上集中表现为无神论的医疗活动与有神论的鬼神迷信的斗争，也就是医与巫的斗争。

巫是阶级分化的产物。从原始公社制过渡到奴隶制，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出现了以进行迷信活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特殊阶层——“巫”。巫通过占卜等方法，谎称自己是沟通神鬼与人联系的媒介，能传达上帝、祖先（神、鬼）的旨意，代表神鬼（实即奴隶主贵族统治者）发言。他们不仅主管祈祷、祭祀活动，还参加国家政治活动；并利用从劳动群众中剽窃的医药知识，以迷信方式进行医疗活动。统治者及巫宣扬疾病是鬼神作祟所致，巫治病就是用祈祷、禁咒等方法，以求上帝、祖先保佑，请鬼神饶恕。巫的活动给朴素的医疗实践罩上了宗教迷信的外衣，严重阻碍着医学的发展。

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除使用暴力手段外，还大肆宣扬“天命观”以欺骗人民，强化思想统治，巫就是奴隶主用来欺骗奴役人民，维护反动统治的工具。儒家为了挽救奴隶制的灭亡，鼓吹“天命论”，手法之一就是大肆宣扬巫祝迷信，孔老二就是扬巫抑医的干将。他一方面把疾病生死说成是“天命”注定的，让人生病时去祷告求神，如他的学生冉伯牛病重时，他哀叫“死定啦，这是天命啊！”（“亡之，命也夫”《论语》）当他自己有病时就再三祈祷（“子

疾病，子路请祷，曰‘丘祷之久矣’”（《论语·述而篇》）；另一方面却反对真正的医疗活动，不相信医药，如鲁国季康子送药给他，他连忙拒绝说：“我不懂药，不敢吃”（“丘未达，不敢尝”《论语》）。同时，孔老二还拼命为巫打气说：“人而无恒，不可作巫医”，要巫医“恒其德”——就是坚定“克己复礼”的决心，可见儒家宣扬巫神迷信是为其反动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儒和巫在“天命”、鬼神论上你呼我应，配合如此紧密，正说明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都是奴隶主贵族的代言人，都是为维护反动的奴隶制度服务的。

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要革新、要前进，要推翻奴隶制、建立封建制，就必然要宣传唯物论，反对“天命论”，主张无神论、反对巫祝迷信。如春秋时的前期法家郑国子产就明确指出：疾病是因饮食、情志不正常等因素所致，不是什么鬼神造成的（“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与焉？”）。齐国晏婴也说：疾病是因生活不节所致，求神也没有用。管仲也曾尖锐批评统治者靠巫祝治病只能带来危害（“而恃常之巫，彼将以此无不为也”）。他们都坚持朴素的唯物论，反对巫神迷信。战国初期的法家西门豹高举无神论的旗帜，大破了“河伯娶妇”的鬼话，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恶霸和巫的势力。战国后期杰出的法家荀况更是无情地驳斥了儒家“天命论”的谎言，不仅提出“天人相分”的观点，还进一步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观点，指出：“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荀子·天论》），即只要衣食充足、又能适应四时变化而运动锻炼，天就不能使人生病。荀况的“制天命”思想，将一向

是“天管人”的陈腐观念打翻在地，代之以“人管天”的、闪耀着唯物主义光辉的“人定胜天”的崭新概念，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在改革社会、建立封建制度时的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对未来充满着无比的信心。荀况的朴素唯物主义，在先秦诸子百家中达到了未曾有过的高度。他的学生韩非集法家大成，也旗帜鲜明地指出“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法家这种对自然的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及其对“天命”有神论的批判，沉重打击了巫祝迷信，极大地促进了祖国医学的发展和医学理论的形成。

医学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在医学领域中，广大劳动人民和民间医家更是用自己的医疗实践与巫术迷信进行了坚决斗争，从根本上否定了巫术迷信的骗人把戏和“天命论”的唯心主义思想，使祖国医学沿着唯物主义道路向前发展。医疗经验的积累，提高了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增强了人们对疾病的防治能力，使人们逐渐变为控制疾病的主人，这就必然使得儒家巫祝“天命”、鬼神致病的谎言趋于破产。因而医学发展的本身就打击了巫神迷信，动摇了“天命观”。但是，和其他科学一样，医学的发展又是受着社会发展的制约，受着社会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影响。奴隶主贵族利用巫祝将医学引入歧途，儒家之流也鼓吹巫神迷信，阻碍医学发展；而法家对“天命”鬼神论的批判，使得医学从巫术迷信的桎梏下解脱出来，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这就在劳动人民创造医学推动历史前进的基础上促进了医学的发展。

祖国医学在周代已有了分科，当时医生分食医（营养医生）、疾医（内科）、疡医（外科）、兽医四种，这是世界

医学的最早分科。在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中，法家路线战胜儒家路线，特别是思想战线上法家对儒家“天命论”的斗争，沉重打击了巫的势力，促使医学发展，民间专业医生大量出现，在此基础上，战国时期医学实践有了飞跃进步，并在朴素唯物思想指导下，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医学理论。如春秋后期秦国的医和给晋平公看病时，指出疾病不是鬼神所致，提出了“六气”（阴、阳、风、雨、晦、明）致病说，认为六气太过是疾病发生的原因（“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四肢〕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这是祖国医学最早的病因学说，它完全抛弃了天命鬼神致病的谎言，不能不说是病因学的一个重大发展。在诊断上，这些医家是通过客观检查来判断疾病的，否定了巫术占卜的那套鬼把戏，坚持了唯物论的反映论。如《周礼·天官》记有“以五气、五声、五色臤其死生”即从病人的气色、声容来观察辨别病情。而战国初期的著名民间医生扁鹊（秦越人）更是通过“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史记·扁鹊列传》），已可说完全是用中医的“四诊”方法诊断疾病的。他尤精于切脉，对祖国医学的脉诊作出了贡献。在治疗上，受法家思想影响的医家们摒弃了祈祷、禁咒等迷信方式，从实践经验总结发展了内服药、针灸、外科手术等多种治疗方法，仅外科就有用药、排脓、清创等治疗，并已走上了理论化道路，如说：“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

上述医学实践与理论都贯穿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是反对儒家“天命论”、破除巫神迷信斗争的结果。上面提到的医和、扁鹊是先秦医家中的杰出代表，从史书中关于他们事